

现代性指的是自 17、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率先形成并逐步扩展到全球的一种文明形态。它标志着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封建制度、宗教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以理性、进步、自由、个体权利为核心价值的新时代。虽然现代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与进步，但如今，在资本逻辑和雇佣劳动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它对人逐渐表现为新的束缚。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始终围绕着“人”这一核心展开。随着数字革命的深入推进，人类社会正步入一个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新阶段。数字化浪潮不仅重构了全球经济格局，也对个体的思维方式、交往模式及价值观念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但是在这一背景下，数字技术非但没有消解这种对“人”的束缚，反而将其深化、内化。所以在这个被数字技术深刻重塑的时代，仍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所提出的“现代性”这一命题，分析数字技术如何被资本逻辑所吸纳并重塑，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矛盾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延续与激化，并在这一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探索数字时代“人的现代化”得以可能的现实路径。

一、马克思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内在逻辑

(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双重身份：历史进步的现代性和批判对象的现代性

一是作为历史进步的现代性体现在生产力的解放与文明形态的跃迁。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资本主义打破了封建的、宗法的社会关系束缚，通过市场竞争、科技创新和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逐，驱使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同时，它凭借世界市场和全球贸易，将一切民族都卷入现代文明，开创了真正的“世界历史”，为人类的普遍交往奠定了基础。马克思的批判，正是建立在这一历史肯定的前提之上。

二是作为批判对象的现代性体现在生产力的内部对抗。尽管资本主义在其特定历史阶段展现出了革命性与进步性，但这并不足以掩盖其自身固有的、根深蒂固的矛盾与弊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力的进步以一种矛盾的形式呈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非但没有缩短劳动时间，反而与工作时间的实际延长同步发生。这种结构性的悖论同样渗透至社会生活领域：社会总财富的不断积累，伴随着劳动者经济与社会处境的相对乃至绝对恶化。由此，技术的飞跃与生产力的扩张并未转化为劳动者整体生活状况的改善，反而系统性地与普遍贫困、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相互交织。更深刻的是，科学技术在增强人类支配物质世界能力的同时，也重构了人与物的关系——人是追

马克思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视角下数字时代“人的现代化”的实现

■ 何沂蓓 李雨溪

求对物的占有，便越深地陷入被物化逻辑支配的生存状态，从而在更高程度上沦为自身造物的附庸。

(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质：资本增值逻辑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部批判，最终都指向其最核心、最根本的运行原则——资本增值逻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所有核心矛盾与危机，都根植于资本增值逻辑的内在特性。其一，资本对无限增值的绝对渴求，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类承受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这导致了生态危机、生产过剩危机以及社会承受力的崩溃。其二，市场交换领域宣扬自由、平等、所有权，但一旦进入生产领域，这些形式便立即瓦解，暴露出资本对活劳动的支配、剥削和剩余价值占有的实质。其三，在资本逻辑下，技术创新的直接目的并非减轻劳动、增加自由，而是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强化对劳动的控制、排挤活劳动。这导致了一方面生产力飞跃，另一方面却可能造成工人失业、劳动强化和技能退化。科技成为资本权力规训劳动的有力工具。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质，就是一个以资本增值为绝对目的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人、自然、社会要素都被转化为服务于这一抽象目的的手段和资源。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在本质上都受制于这一逻辑。

(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出路：无产阶级的解放

其一，从“资本”与“人本”的对立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指出，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无产阶级解放意味着，将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目的重新奠定在“现实的人及其需要”之上。资本将回归为受人控制、为人服务的客体 and 手段。其二，从人与人对立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现代性创造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是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空前发展，使人前所未有地相互依存；另一方面，这种依存关系却以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同每个人相对立。一方面，工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下实现“自我异化”，即工人生产的对象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和使用，“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另一方面，人与人的对立是自我异化的现实延伸，“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社会关系变革，便是通过革命手段废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社会

共同占有。这并非要消灭个人的、基于自身劳动的财产，而是要消灭那种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去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权力基础。

二、数字时代现代性批判

(一)数字劳动异化：人的“新贫困化”与“空心化”

数字技术的发展并未消解马克思所批判的现代性矛盾，而是以新的社会技术形态重构并深化了这些矛盾。数字劳动面临隐性剥削与新贫困形态。一方面，用户的浏览、社交、娱乐等行为被平台定义为“使用”而非“劳动”，但其产生的行为数据——这一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资料——却被平台无偿占有并用于算法优化与精准广告，创造巨额利润。这构成了对用户注意力和生命时间的系统性无偿剥削。而另一方面，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内容创作者等看似“灵活就业”，实则深陷算法监控、收入波动、社会保障缺失的困境。他们承担经营风险与生产资料成本，却难以享受正式劳动者的权益，陷入“忙于生存而无暇发展”。这种情况下，“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工人要维持生存，就必须接受越来越苛刻的劳动条件。相反“大多数人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

长此以往，个体的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反思能力逐渐萎缩，内在精神世界趋于贫瘠，形成认知层面的“空心化”。数字平台通过评分系统、派单算法、流量推荐机制等，对劳动者进行着精密的规训。内容创作者研究算法偏好以生产“爆款”，外卖员学习如何优化路线以应对系统严苛的送餐时限。这导致劳动者发展的并非全面、自主的能力，而是高度适配特定平台规则的、可被快速替换的“条件反射”式技能。一旦脱离该平台生态，这些技能可能迅速贬值。

(二)数字拜物教：关系的“功利化”与“疏离化”

在数字化时代，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拜物教”并未消亡，而是变成了数字拜物教。“借助于网络技术和数字信息，实现了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数字化生存以及资本的持续积累和不断增殖”。其核心特征在于，社会关系的本质被深度遮蔽，人们不仅崇拜作为商品的物，更狂热地崇拜作为抽象价值载体的数据、流量、算法等平台影响力。这种新型拜物教深刻地重塑了人际关系的性质，导致其呈现出“功利化”与“疏离化”并存的状态。一方面，在数字拜物教的逻辑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系统地重构为一种可计算、可交换、旨在实现某种“数字资本”增殖的工具性连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沉溺于虚

拟空间，对数字环境的依赖不断加深。这导致人们对外界真实社会交往的需求逐渐减弱，现实沟通能力明显退化，人际互动的深度与广度被不断侵蚀，社会关系网络也趋向扁平与单一。数字依存不仅削弱了人在现实中的联结，也使社会交往本应具有的丰富层次和多元形态日渐萎缩。

(三)时间殖民：自由的“幻覺化”与“内卷化”

数字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弹性”：弹性工作、弹性学习、弹性社交。这种弹性最初被包装为“赋权”与“自由选择”，但实则成为一种更为精致的支配形式。以弹性工作为例，996、886 等超时工作制被合理化包装，数字平台成为数字劳工“永远在线”的场域，“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从事奴隶劳动。”此外，在注意力经济中，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其成功高度依赖于在数字空间中的“可见性”。而算法对“新鲜度”和“互动率”的偏好，迫使参与者进行一场无休止的、高强度的竞赛。以短视频平台为例，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生产——无论是拍摄、剪辑、直播还是互动——往往被感知为一种娱乐、一种表达、一种社交。平台话术巧妙地将“劳动”包装为“创作”，将“剥削”隐于“玩”的表象之下。由于平台资源的稀缺性和分配算法的黑箱属性，仅有极少数头部用户能够实现盈利变现，而海量的普通用户则陷入“用爱发电”的困境。这种为获取或维持相对优势而投入的过度劳动时间，是一种个体的“内卷化”消耗。

三、数字时代“人的现代化”的实现

(一)人的劳动本质的复归

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于人所说的生成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通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来将自身与其他动物作出直接区分，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因此，在数字时代人的劳动本质的复归，就是要使劳动从异化的枷锁中解放，重新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其一，实现对劳动资料的重新占有。在数字时代中，关键的生产资料——数据、算法、平台基础设施——被少数巨型科技公司私有垄断，而劳动者在贡献数据与劳动的同时，却不掌握生产资料，这是异化的根源。要实现劳动本质复归，必须打破这种私有垄断，探索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形式。其二，劳动成果的全面享有。数字劳动者创造的海量价值绝大部分被平台资本攫取，劳动者仅获得微薄报酬甚至无偿贡献，劳动

成果与劳动者相异化。需要探索建立更公正的价值分配机制，使劳动者能分享其劳动而增长的共同财富。其三，劳动意义的重新发现。在异化状态下，劳动仅是谋生手段，枯燥而繁琐。数字时代劳动的碎片化进一步消解了其在意义。社会应创造条件，利用技术进步与社会安排，鼓励和保障那些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创造力和潜能的劳动形式，使其向马克思设想的“生活的第一需要”迈进。

(二)人的精神世界的复归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不仅深刻剖析了人在物质层面的生存困境，更穿透至精神世界的深处，揭示出在资本逻辑全面支配的生产方式下，如何催生出普遍的物化意识与内在精神的荒芜。一方面要取缔“数字崇拜”，打破技术神话，需明确技术逻辑屈从于资本逻辑的实质。数字技术是在特定社会的应用中发挥效果，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数字技术不可能是公共共享的，而是服务于资本逻辑，满足资本增值和资本统治的需要。对于数字技术的崇拜以及相关意识形态的塑造遮蔽了背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要消解数字孤岛。《新媒体蓝皮书》显示，在 1998-2010 年间网络舆论在近七成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动问题解决的积极作用。因此，应当重建社会数字公共空间。数字技术需要为社会共同参与提供更多的工具和渠道，使得用户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

(三)人的生活时间的复归

时间是人的存在尺度，克服数字时代的时间剥削，其根本出路不在于技术改良，而在于人的主体性的回归。作为掌握时间主权的主体，人不仅应当推动社会制度变革推动创造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更需具备将自由时间有效转化为自我发展实践的能力，让技术从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回归为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其一，构建数字素养培育体系。该体系应重点增强公众三方面的核心能力——对算法运作逻辑的识别与批判能力、对数字信息的筛选与判断能力、自主规划与管理时间的意识。其二，唤醒数字劳动者的时间主权意识。如果说数字素养体系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地使用时间”，那么时间主权意识的培养则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时间究竟属于谁？”必须引导人们辩证审视数字时代异化的现象，揭示其背后隐匿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特别是资本逻辑如何通过算法机制实现对生命时间的系统性殖民。唯有使数字劳动者能够洞察自身行于系统内隐含的资本支配机制，方能真正摆脱平台控制，重拾时间主权。

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马克思复杂—简单劳动视域下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问题研究”（项目编号：XYCS2026148）。（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职业院校智能化教学环境：内涵革新与体系构成探析

■ 吴晓燕

一、人工智能时代职业院校智能化教学环境的内涵变革

传统教学环境主要指教学活动开展所需的硬件设施、时空条件、人际氛围等基础条件，是教学资源与师生人际关系的有机结合，围绕课堂教学构建而成。而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职业院校智能化教学环境，实现了教育场景与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突破了传统教学环境的局限，形成了具备情感感知、自然交互、主动适应、远程协同、人机融合、智能管控的新型教育生态。

相较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侧重实操技能培养，其智能化教学环境更强调实用性、实践性与适配性。对于学生而言，智能化环境可提供泛在学习空间、沉浸式实操场景，支持学生自主探索、自主建构知识与技能体系，有效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实操能力与协作能力，契合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对于教师而言，智能技术可承接学情分析、作业批改、教学数据统计等重复性管理工作，极大释放教师的时间，减少重复劳动，推动教师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向课堂引导者、教学设计者、技能指导者转型。对于教学管理者而言，智能化教学环境可实现教学过程全数据采集、分析与监管，为教学评价、教学督导、资源调配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推动职业院校教学管理从经验化向数字化、精细化转型。

二、职业院校智能化教学环境的核心构成

智能化教学环境是一个复合型动态系统，各构成要素相互关联、协同赋能，贯穿教学全过程。结合职业教育教学特点，可将其划分为智能化物理硬环境与智能化心理软环境两大核心板块，共同支撑智慧教学活动落地实施。

(一)智能化物理教学环境

物理教学环境是智能化教学的硬件基础，是有形、可感知的静态教学条件，经过智能技术升级后，形成适配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智能化硬件体系，主要包含教学设施、自然环境、时空环境三部分。

智能化教学设施是核心载体。除校园楼宇、教室、图书馆、运动场等基础场地外，职业院校重点打造了智能化专用教学空间，包括智慧实训室、虚拟仿真实训室、微格教室、数字化机房、VR 实训室等。依托物联网、虚拟现实技术，各类实训设备实现数字化升级，可模拟真实岗位工作场景，解决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中心设备不足、场景受限、高危操作难开展等问题，贴合职业教育工作岗位要求。

智能化自然环境是基础保障。教室及实训场地的光线、温度、通风、噪音、色彩等物理因素，直接影响师生教学状态。智能环境调控系统可实时感应场地环境数据，自动调节温度、通风与照明，营造舒适、健康的教学场景，有效提升课堂教学与实训训练的效率，保障师生身心健康。

智能化时空环境是重要支撑。智能技术打破了传统教学固定时间、固定场地的局限。时间层面，依托线上教学平台，实现碎片化、全天候泛在学习；空间层面，智慧教室灵活的座位布局、虚实融合的教学场景，可适配小组协作、项目教学、实训实操等多元化教学模式，有效拓展职业教育的教学边界。

(二)智能化心理教学环境

心理教学环境是无形的动态软环境，是智能化教学生态的核心，直接影响师生教学心态与课堂氛围，主要包括人际环境、信息环境、情感环境。

人际环境是核心纽带。职业院校教学涉及师生、生生、师生、校企多元人际关系，其中师生互动、学生协作关系最为关键。智能化教学平台搭建了线上线下融合的沟通渠道，打破课堂沟通壁垒，师生可实时交流答疑、研讨项目问题，学生之间可开展线上协作实训、互助学习，构建平等、高效、和谐的智能化人际氛围。

信息环境是核心资源。智能大数据技术可整合校内教学资源、行业前沿技术、企业岗位标准、职业技能案例等多元信息，构建海量、动态的教学资源库。教学过程不再局限于课本知识，可实时对接行业动态、企业岗位需求，让教学更贴合市场、贴合实操，实现教学信息的精准推送与高效传递。

情感环境是重要保障。智能化教学模式下，教师可依托大数据精准掌握学生学习状态、技能短板，针对性开展个性化指导。同时，多元化的智能教学形式、沉浸式实训场景，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实训积极性，营造积极进取、乐于探索、善于协作的课堂情感氛围，助力高效完成职业教育教学目标。

三、结语

智能化教学环境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载体，区别于传统教学环境，其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学生发展为核心，以技能培养为目标，实现了物理环境与心理环境、虚拟场景与现实教学、技术赋能与教育育人的深度融合。完善智能化教学环境建设，能够有效优化职业院校教学模式、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未来，职业院校需持续深耕智能技术与教育生态的融合创新，持续优化虚实融合的智慧教学生态，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者单位：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树立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启示

■ 辛梅华

2024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将其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词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产生，其思想根基深植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沃土之中。1927 年，毛泽东深入湖南五县进行为期 32 天的实地考察，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篇光辉文献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关于农民问题的经典之作，更蕴含着“为谁干”“怎样干”“以什么标准评判”等根本性命题。重温《报告》精神，挖掘其与新时代正确政绩观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新征程上端正政绩观方向、站稳人民立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核心精神

1926 年下半年至 1927 年初，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然而党内却出现了大量质疑之声，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糟得很”。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凭主观臆断下结论，而是亲赴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与农民同吃同住，召开各类座谈会，掌握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他以雄辩的事实作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著名论断，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亿万农民一边。

《报告》的精神内核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把握。一是鲜明的人民立场——农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当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32 天的深入调查是一切正确判断的前提，毛泽东以亲身实践证明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基本原则。三是对群众首创精神的高度尊重——《报告》详细记录了农民自发建立农会、兴办合作社、修路筑堤、普及教育等十四件大事，充分肯定了群众在实践中展现出的创造力。这三重精神构成了《报告》历久弥新的思想力量，也为我们理解新时代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坐标。

二、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与现实针对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核心要义在于：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民造福，而非为个人仕途铺路；政绩的衡量标准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非冰冷的数字和表面的光鲜；政绩的实现路径是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而非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正确处理“显绩”与“潜绩”的关系，不计较个人功名，不贪一时之功。

提出这一要求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当前，一些地方和干部身上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政绩观偏差：有的拍脑袋决策，脱离实际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有的热衷于堆砌数据，打造“盆景式”典型，群众却无实际获得感；有的片面追求短期效果，不惜举债搞建设，留下一堆烂摊子。这些现象的本质是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遗忘了“人民是阅卷人”的根本准则——而这恰恰是九十多年前的《报告》就已深刻回应的根本之问。

三、《报告》精神对树立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三重启示

第一，政绩之“魂”在于人民至上，必须回答好“为谁创造政绩”的根本问题。当年，

毛泽东评判农民运动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真正有利于农民的翻身解放。面对“糟得很”的指责，他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发出“好得很”的时代强音。今天，树立正确政绩观同样要求干部把“群众不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第一标准。以福建宁德为例，习近平同志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没有追求轰动效应的“大项目”，而是把力量集中在解决群众最迫切的温饱问题和“茅草房改造”上，带领闽东百姓走出了一条“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脱贫之路。这种甘做铺路、不事张扬的工作，在当时看似没有“显绩”，却真正改变了闽东人民的命运，成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生动注脚。从革命年代的“一切为了群众”到新时代的“以人民为中心”，变化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的价值底色。

第二，政绩之“基”在于调查研究，必须回答好“靠什么创造政绩”的方法问题。毛泽东 32 天的田间地头调查，是《报告》一切正确论断的基石。他用事实说话，以调研破除偏见，深刻诠释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真理。这一精神在新时代得到了制度化传承。“四下基层”——宣传战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正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首创并大力倡导的工作制度。它要求领导干部不能“坐在机关等报告”，而是带着问题“沉到一线找答案”。2023 年，中央将学习推广“四下基层”作为第二批主题教育的重要抓手，浙江“浦江经验”、福建“远亲不如近邻”基层治理模式等地方实践蓬勃展开，其精神内核与当年毛泽东反对“坐在长沙”凭空评价农民运动如出一辙。真正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从来都不是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深入基层、摸清实情后“干”出来的。

第三，政绩之“尺”在于群众评判，必须回答好“由谁检验政绩”的标杆问题。《报告》最动人之处，在于毛泽东让农民自己来讲述运动的成效：修了多少路、办了多少学、除掉了多少陋习，群众的亲身实践就是最有力的答卷。这一精神启示我们，政绩的评判权应当交给人民群众。近年来，多地在于干部考核中探索增加群众评价权重，如北京市“接诉即办”机制将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的群众诉求响应率、解决率和满意率作为考核街乡镇的核心指标，倒逼基层干部从“对上负责”转向“对下负责”，让“群众的口碑”真正成为“干部的奖杯”。从当年《报告》中的“让农民说话”到今天的“让群众打分”，体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是阅卷人”这一执政理念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升华。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于九十多年前的革命烽火之中，新时代正确政绩观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重大课题。二者跨越一个世纪，却在精神实质上深度融合。从“革命为了谁”到“发展为了谁”，从“到群众中去搞调查”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让农民来评判”到“人民是阅卷人”，贯穿其中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人民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新征程上，重温《报告》精神，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从历史深处汲取智慧，真正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交出让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数字劳动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启示

■ 田 甜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平台经济、智能制造、远程协作、算法管理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劳动形态、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劳动作为信息技术深度嵌入生产生活的要素，正在重塑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的劳动方式。面对数字劳动的新变化，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把握当代劳动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有助于在新技术条件下更好维护劳动者权益、推动劳动关系合理调整，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一、数字劳动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现实场域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根本途径。劳动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也塑造了人的本质力量。进入数字时代，劳动的对象、手段和组织形式都呈现出新的特征。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平台成为重要劳动载体，算法成为影响劳动过程的重要力量，劳动场景也由传统的工厂车间不断延伸到网络空间、虚拟平台与智能终端。

数字劳动新变化表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并没有因技术变革而失去解释力，反而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展现出更强的理论穿透力。无论劳动形态如何变化，劳动作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一基本逻辑并未改变。数字技术可以提高劳动效率、重组劳动流程、拓展劳动边界，但技术本身并不能脱离劳动者而独立创造价值。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数字劳动的发展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否定，而是为其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和现实内容。

二、数字劳动新变化凸显了劳动者主体地位

的重要性

数字劳动的发展，一方面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劳动者面临新的处境和挑战。平台接单、算法派工、数据监测、在线考核等新型管理模式，在提升协同效率的同时，也容易使劳动过程更加加密化、透明化和实时化。部分劳动者在时间安排上看似更加灵活，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面临劳动边界模糊、工作强度加大、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劳动者处境的同步改善，这一现实再次提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中的劳动者主体立场。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强调，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数字劳动条件下，越是技术快速变革，越要重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越要防止劳动者在算法逻辑和资本逻辑双重作用下被工具化、数据化和边缘化。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不能只看到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也要关注劳动者的尊严、权益和全面发展。只有把劳动者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完善劳动保障制度，健全收入分配机制，优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才能真正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统一。

三、数字劳动发展要求在守正创新中深化对劳动价值的认识

数字劳动的新变化，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首先，要更加全面认识劳动的丰富内涵。随着数字技术广泛应用，脑力劳动、情感劳动、协作劳动、数据劳动等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劳动成果的形成越来越体现为多主体、多环节、多层次的共同作用。这要求我们在坚持劳动创造价值基本立

场的同时，更加重视劳动形态多样化带来的新特点。

其次，要正确处理技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技术进步本应服务于人的解放和发展，而不应成为加剧劳动异化的新工具。数字劳动领域中，资本往往借助技术手段增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这提醒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挥制度优势，推动技术向善，资本有序、劳动受尊重，使数字化转型真正建立在促进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的基础之上。

再次，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数字劳动治理的重要目标。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价值旨归，不仅在于提高生产效率、积累社会财富，更在于通过劳动推动人的能力提升、个性发展和社会进步。面对数字劳动新变化，必须更加重视劳动教育、技能培训和终身学习，帮助劳动者适应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不断提升参与现代劳动分工的能力，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力支撑。

四、结语

数字劳动新变化，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在劳动领域的集中体现，也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提供了新的现实课题。无论劳动形态如何变化，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是主体、劳动应当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本立场始终没有改变。新征程上，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数字劳动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更好维护劳动者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统一，让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数字时代持续焕发真理光芒与实践力量。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